不可思议的“环保”实则是生态造假

□本报评论员　蒋　菡

—中国新闻名专栏—
社评

改善大气环境不能以破坏植物生存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同样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诉求，有关部门要有大刀阔斧的决心，也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

据《新京报》报道，8月8日，有网友爆料称，河南商丘用水泥浇灌树根来抑制空气浮尘，并配有9张照片。该市市委宣传部8月10日通报称：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为减少黄土裸露，该市梁园区对破损严重的人行道实施硬化，但由于监管不到位，部分人行道树池也被一体硬化。事发后已责令整改，且有4名涉事官员被处分。

“水泥封树”看似小事一桩，其图片之所以在网上疯传，主要因为其违背常识的荒诞，如同几年前某地给荒山涂绿漆事件一样，以不可思议的”环保”方式挑战着公众的神经。山看起来绿了，实则是一种与环保无关的生态造假；用水泥封住了黄土，却也封住了树根获取水分的通道。即便如官方所说“招用的社会施工队没有按照要求施工”，意即是“外面人”干的，但“上面人”一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工程外包无可厚非，但有关部门必须明确要求、监管到位，才能保证改善环境的初衷得以实现。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的重视，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关切度的提升，地方政府的环保压力与日俱增，环保工作力度则在不断加大。以河南为例，7月初，该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动员会议，18个市长立下治理大气污染的”军令状”。8月5日，河南省住建厅公布《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标准》，对扬尘治理的主体责任、监管范围、控制措施等都做了明确规定。而截至7月底，该省共查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问题204起，累计问责389人。可以说，当下很多地方改善大气污染防治严峻形势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具体到执行层面，还需要相关人员更科学、更严谨、更负责任，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欲速则不达”的笑话来。

环保是个技术活，不能简单粗暴，否则即便初衷良善，也未必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其实，防止黄土裸露有简单易行的办法，用树皮、鹅卵石遮盖都可以起到既防尘又美观的效果。至于一些采石场遗留下的山崖，植物确实很难生长，但涂漆只是做表面文章，在岩石上喷洒含有草籽的泥浆，或在岩石上覆膜后再种植物，都是让荒山真正绿起来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问计于民、科学决策，而非盲目地“拍脑袋”。

环保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程，不能急功近利，需要尊重客观规律，大干快上的结果往往只能适得其反。环境问题并非一天之内形成，解决环境问题既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又不能完全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类似给荒山涂漆的做法看似立竿见影，实则对于环境改善毫无帮助，甚至会帮倒忙。精心培育植被，从根本上改变荒山面貌，虽非一朝一夕之功，却是必须要过的“坎儿”。切实有效地改善环境，有关部门要有大刀阔斧的决心，也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

环保还是个需要统筹兼顾的工作。如果仅仅抱着应付了事的念头，不做长远考虑、综合考量，那么很可能出现“顾头不顾腚”的现象。“水泥封树”虽然可以封住黄土，但如果大树因此死亡，城市又该失去多少净化空气的“绿肺”？改善大气环境不能以破坏植物生存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同样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诉求。最近，有报道称山西蒲县开展“封山禁牧专项整治行动”，严禁任何人在野外放牧山羊，否则限期变卖处理。有农民把两年前就已价值9万多元的羊，以两万多元的价格贱卖了。为保护生态封山禁牧很有必要，却不是一禁了之那么简单，牧民利益同样不能忽视，有关方面理应对其生活保障做出相应政策安排。要想让环保政策顺利落地并持久发挥效应，就应在政策制定之初，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利益。

做环保工作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埋头蛮干。改善环境不太可能凭借“洪荒之力”一蹴而就，需要有关部门在下大决心的同时，秉持科学态度、专业精神、责任意识，扎扎实实推进。

扫描二维码关注“钟鼓声”，看工人日报“钟鼓君”评论。

野外放生要守法

据《成都商报》报道，前不久，两辆车来到四川绵阳千佛山保护区附近的村镇放生了大量的蛇，此时正值山中林木、药材生长旺季，有蛇出没，村民们不得不停止上山采药。目前，千佛山保护处已诱捕了150多条蛇。

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不少人有放生的习惯，这本是功德之事，但只顾自己开心罔顾后果的“博爱”却是种自私，尤其是放生诸如蛇这样的凶猛动物，不但可能对当地生态环境平衡造成影响，还会给周边群众带来安全隐患，而根据新修改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放生必须得到相关部门批准，并在适合的地方进行，随意放生可能将会担责。

熊娃出走为哪般？

据《华商报》报道，日前，陕西凤翔县的一对熊孩子让父母操了不少心，8岁的弟弟因为不愿意写作业被批评，萌生了离家出走的想法，于是和12岁的哥哥一起偷走家中2000元现金，去乡下姥爷家“避难”，走前还故意翻乱家中衣物，伪造出“被盗”现场。

熊孩子如此“调皮”，令人啼笑皆非，而闹剧背后的原因仅仅是孩子不想写作业被家长训斥。孩子贪玩不爱学习自然不是家长愿意看到的现象，可动辄训斥甚至辱骂的教育方式显然也有问题。如何引导孩子学习，是个智力活儿，不是骂几句就行得通的。家长平时应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多交流沟通，别等到发生一些不安全的事故后才追悔莫及。

专业碰瓷套路深

据《重庆晨报》报道，近日，重庆一名无业男子，狠心砸断了自己的手指，伙同他人在路上寻找目标，进而假装被撞受伤，要求赔偿。结果仍没能骗过警方，不仅血本无归，还进了看守所。

时下“碰瓷”横行，且不少人执着于此，甚至组团专业碰瓷，恰恰因为这是项风险与回报并存、几乎零成本且一旦成功便有可观收益的“工作”——刑法没有独立的恐吓罪，不利于对付未遂的敲诈，而治安处罚也力度有限。如今虽然不少车上装有行车记录仪，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难免百密一疏、关键时刻“掉链子”。期待法律能尽快对碰瓷施以重典，还马路一片清静。　□吴迪

打击“空闹”：处罚加码是应有之义

□冯海宁

治理“空闹”已基本形成了“组合拳”，包括追究刑责、拘留、经济处罚、纳入“黑名单”等。此外，部分“空闹”也与航班服务不足有很大关系，对问题航空公司的治理是否也形成了“组合拳”？值得思考。

飞机起飞了还在用手机打电话、在机舱内吸烟、辱骂机组人员……这些“空闹”问题今后将被重拳打击。中国民用航空局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78个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或删除，新增24条。“空闹”将面临最高五万元的罚款。(见8月10日《京华时报》)

尽管刑法、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都为打击“空闹”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各种“空闹”仍不时上演，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过乘客“泼空姐”、擅自打开飞机应急舱门等多起事件。处罚太轻被不少人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构成犯罪的才会追究刑责。而一般“空闹”，即对航班正常营运造成非法干扰的旅客，只能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而此次意见稿对14类非法干扰行为的罚款额度提高到最高五万元罚款，法律震慑力大大增强。

对于治理“空闹”，坊间有不同声音，有一种声音认为不能靠立法只重罚乘客，理由有很多，比如航班服务不足也是“空闹”的一大诱因；并不是现行法律太“软”，而是执行效果差，如一些航班人员对“空闹”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但从“空闹”影响来说，处罚加码是应有之义。因为“空闹”不仅破坏了正常秩序，损害航空公司及其他乘客利益，而且还对航空安全、公共安全造成一定威胁。比如飞机上打电话，手机信号频率会干扰飞机仪表工作频率，这会导致驾驶员无法和地面联系并使某些仪表失灵。美国已发生过相关事故。

况且，现实中追究刑责有相关标准，当非法干扰行为达不到追究刑责的标准时，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只有对一般“空闹”行为这样的“小恶”加大处罚力度，才能防止出现大的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

从国外情况来看，对“空闹”的经济处罚也很重。比如根据瑞士《联邦航空法》，对于触犯航空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的乘客，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可处以最高4万瑞郎(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我国这次大幅提高经济罚款额度，也是一种必要措施，因为罚款不是目的，法律对乘客进行警示教育、预防“空闹”发生才是目的。

目前，治理“空闹”基本形成了“组合拳”，包括追究刑责、拘留、经济处罚、纳入“黑名单”等。此外，部分“空闹”也与航班服务不足有很大关系，对问题航空公司的治理是否也形成了“组合拳”？值得思考。只有对“空闹”乘客和问题航空公司拿出同样的治理力度，才能更有效果，才能让公众有公平感。

新闻观察

证书“陷阱”

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内多地玉石市场乱象，有A货的鉴定证书仅仅表示是天然石头、并非伪造，却未必说明玉石价值高，而不少商家正是利用消费者对证书的盲目信任抬高价格。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出现的珠宝方面的纠纷一般不是因为卖假货，而是价格欺诈。

一面是商家过度解读鉴定证书的证明力，却不向消费者说明鉴定证书到底证明什么，一面是消费者只认证书不识玉，误以为价越高质越好，“愿打愿挨”之下，玉石交易便产生了价格任性的空间。时下，越来越多的人将兴趣和精力投向文玩交易、珠宝收藏等领域，而神秘感与猫腻儿相生相伴，也恰恰是这些领域的一大特征。如今媒体用心良苦的暗访，是曝光更是科普，出于个人爱好也好，为了增值获利也罢，有心涉足者，最好提前做足功课。缺乏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和了解，仅凭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想就轻易出手，难免成了“冤大头”。　□赵春青/图　韫超/文

图说

毕业生就业意愿，你读懂了吗？

□然　玉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是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投射，更是城市分层和产业布局集聚化的直接结果。

北京高校毕业生期望月薪平均值7411元，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毕业去向前三名依旧是北上广，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仍是毕业生首选……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了“2016年北京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及就业意愿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等24所在京高校的1686位应届毕业生。(见8月10日《北京青年报》)

从舆论反馈看，调查结论的主要看点有二：其一，北京高校毕业生期望月薪“较高”，至少高过了公众接受上限；其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仍是首选毕业去向，这与时下流行的“逃离北上广”论调构成了明显反差。当然，这终究只是次意愿调查，“预想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状态”，毕业生此刻所流露出的心理偏好，终究还得与“坚硬的现实”相调适才是。

仔细分析，想去北上广工作，想拿七八千的薪酬，二者实则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大城市工作，往往意味着较高的职业回报，而且倘若考虑到北上广的生活成本，“7411元的期望月薪”似乎也没高得那么离谱。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其已然呈现出“高门槛”和“保守性”，由此所造成的人才驱离效应，正在给“后来者”带来极大心理焦虑。

毕业生去北上广工作，意图追求“相对高薪”，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需求？将之理解为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机制，或许更为恰当。当毕业生们置之于“不太友好”的大城市中，忍受着种种“大城市病”的重压时，谁又能说拥有一份较为体面的收入，不是抵御内心焦虑、寻找价值寄托的较好方式？当大城市的孤独感、压迫感让生活充满焦虑时，或许加倍努力、加快赚钱，才可以找寻到更好的精神慰藉。

“留在大城市赚大钱”，是许多毕业生的内心期许，可以将其视作是意气风发的自我砥砺，亦可看成是无奈之下的被动选择。从产业结构、就业岗位，以及竞争机制的公平性来说，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确具备鲜明优势。一面是“逃离北上广”，另一面是“回不去的故乡”，这种尴尬和苦闷，逼迫着太多年轻人索性投身于“追求物质积累”的价值路径中去。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是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投射，更是城市分层和产业布局集聚化的直接结果。个中反映的隐含信息值得思考，更值得追问的是，我们是否当真给年轻人创造了足够多元的人生机会？他们的进取心和焦虑感，又该如何安放？

这场观摩会就像一本教科书

(上接第1版)

情势又倒了过来。行政方开始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和权衡。最后，总经理王力直起身子说，公司的管理人员都是从一线职工中培养起来的，还有技能培训等，都是职工看不到的福利；但企业也充分考虑到职工的难处和将来的发展。“这样吧，我现在提出涨幅上调至8%，希望职工方能考虑企业的现状与做出的努力，在公司整体利益下滑的前提下，这个涨幅已经是企业的上线，希望职工方慎重考虑。”

又轮到职工方内部商量了，3人小声讨论。经过较长时间的掂量，张普国清清嗓子说：“非常感谢企业方能考虑职工方的意见和要求，经我方商讨，同意并最后达成工资增长8%的幅度。”

一直带着一丝紧张的行政方3人，都松了一口气。职工方3人也轻松起来。工资集体协议当场签订，现场响起掌声。

打造专职指导员队伍

西安市总工会调研发现，大量的各类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普遍存在着工资集体协商“不敢谈”、“不会谈”、“谈不成”的问题：企业管理方习惯于“我给员工发工资还用跟谁谈吗”，一些工会干部缺乏“向行政发出协商要约”的勇气，就算老板同意协商却还不知道怎么展开协商。

2014年，西安市总从顶层设计入手，联合市人大、市人社局等部门展开专题调研论证，用4个月时间，实地走访企业40多家，发放调研问卷3000余份，与200多名各方代表深入座谈交流，形成了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草案建议稿，从制度上为企业开展集体协商提供依据，从程序上指导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目前，条例草案正等待市人大二次审议。

“由于基层工会人员紧缺，身兼数职的现象普遍，集体协商工作常常没有专人负责，而且大部分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集体协商知识，推行起来难度较大，因此基层对于聘用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的意愿非常强烈。”西安市总法律部部长许丽说。

为此，西安市总抓住“牛鼻子”——打造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展开突破行动。

西安市总常务副主席蔡全发介绍，市总利用政府公益性岗位公开招聘了30名指导员，经过集中学习培训，派驻到全市13个区县、9个产业工会、8个开发区工会，使每个县区、开发区工会都有一名专职指导员。30名专职指导员加上原有的173名兼职指导员，全市指导工资集体协商的人才队伍超过200人。

丹若尔酒业公司的工资集体协商现场，30名专职指导员悉数前往。“我们正在进行辖区奥达集团的协商准备，有了这次观摩，我会制作一个更加清晰易懂的流程图供他们参考。”指导员董奥娜说，鲜活的“课堂”既是生动的培训，也给他们以鼓舞。

实现工资集体协商“谈得成”

由于西安市总从政策、工作层面不断加力推进，各基层工会有了具体抓落实的专兼职指导员，还有一些典型引路，该市工资集体协商的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不敢谈”、“不会谈”到“敢于谈”、“能够谈”，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实现了“谈得成”。

董奥娜是今年1月派到新城区总工会的，经过一个月的熟悉，就开始接手该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她通过调查摸底，迅速掌握了9个街道、1个产业园的基本情况。尽管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难度依旧存在，但董奥娜还是打开了局面。

“通过和街道负责人员反复梳理，确定了在陕西千细胞工程有限公司率先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我们自始至终给予指导，包括给企业工会主席讲解流程、帮助他们确定双方谈判代表、规范要约书格式、反复修改谈判词等等。”董奥娜说，经过三轮谈判协商，该公司劳资双方签署协议，今年为员工增资5%，比企业最早提出的比例高2个百分点。

西安市总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基层工会相关干部，特别是指导员们，通过强化学习培训和现场观摩，对工资集体协商的程序、内容、协商的重点和协商的主体、协商技巧等，都有了一个全面的掌握，增强了大家工资集体协商“可以谈”的底气、“如何谈”的方法、“谈得成”的信念，使工资集体协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统计显示，去年底，全市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2万多份，覆盖企业近5万家、128万人，覆盖率90.63%。但仅仅过去半年，到今年6月底，西安市已建会企业共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34701份，覆盖企业50567家、133万人，覆盖率达90.81%。

14类证明派出所不再出具

(上接第1版)

在无犯罪记录证明方面，意见指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负责受理、审核和处理有关犯罪记录的查询申请。公安派出所在向社会提供犯罪信息查询服务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关于升学、服现役、就业等资格、条件的规定办理。公民因办理出国(境)事务需要，可以申请查询本人有无犯罪记录。使用犯罪人员信息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查询目的使用有关信息，对犯罪人员信息要严格保密。

此外，意见也对被拐儿童身份证明、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非正常死亡证明等证明的开具作出了规定。

这些证明须由相关部门开具

对于那些公安机关职能之外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证明，意见指定了负责部门并明确了办理方法。

需证明当事人婚姻状况的，凭当事人在使用部门的个人声明和能够提供的结婚证、离婚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者离婚证明书、配偶死亡证明等有效证件、证明材料证明，需要核查的，由使用部门按照规定进行核查；需证明当事人文化程度的，凭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或者学校、相关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书证明，或者依法办理公证；需证明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非正常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需证明当事人未登记户口的，区分以下情形办理：因补发《出生医学证明》需核实新生儿未申报出生登记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向公安部门核查；因申报户口登记时需核实当事人未在其他地方登记户口的，由公安部门负责核查；因出国(境)定居需要办理无户籍公证的，由公证机构向公安部门核查。

异地居住退休人员需办理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由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到居住地所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或者县（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认证手续。

因公民个人或者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填写、录入差错等原因，致使公民在有关部门或者单位的登记信息与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护照登记信息不一致，需证明两者为同一人的，由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核查，公安部门根据职责提供必要协助。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上接第1版)

“凡是敢向扶贫资金伸手就决不客气”，本着这样一个原则，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作为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重要任务。

2016年4月22日，中央纪委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作出进一步部署和安排，要求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随着扶贫开发总攻号角的吹响，针对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也吹响了总攻的号角。

出重拳　下猛药——各级纪委多管齐下严惩扶贫领域腐败行为

2016年6月18日，在广西岑溪市南渡镇，一场别开生面的“退款仪式”引来了四邻八乡近千名群众围观。

退款仪式上，梧州市纪委的有关领导将在扶贫领域查处和追回的各类专项资金如数交还到老百姓的手中。这里面既有被基层干部冒领的低保资金，也有向贫困户收取的危房改造补贴的“回扣”。

让被克扣挪用贪占的扶贫资金以最快速度用回到扶贫攻坚的刀刃上，这一切得益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自去年9月开展的“专项工作”。

按照中央纪委部署，广西从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在全区集中开展了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重点查处扶贫领域以权谋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违纪违法问题。

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广西共初核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13091件，立案9392件，目前已处分3823人，诫勉谈话、组织处理1954人，移送司法机关350人。时至今日，专项工作的警示震慑和教育感召作用逐步显现，共有11893名党员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退出违纪款1.14亿元。

不仅是广西，按照中央纪委的统一部署，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力度都在不断的加大。

出重拳、下猛药，在中央纪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力度不断加强，方式方法不断创新。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一方面将多渠道广泛收集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线索作为基础性工作紧抓不放；另一方面将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作为督办重点，开展多轮次、滚动式的重点督办；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通报曝光，形成持续震慑。

建制度　立规矩——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做到透明公开长效常态

2015年8月17日，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连环乡麻坎组的一位村民尝试着拨打了“12345”州委书记、州长与群众直通交流的热线。

这位村民为了脱贫希望承包土地种植果树，结果在找村干部办理一个正常的承包手续时，被村干部索要3000元的“提成”。

“村干部这样要钱，合法吗？”

村民的诉求很快得到回复，村干部不仅没有拿到提成，反而受到了党纪的处理。黔西南州建立的“民意调查中心”给查处扶贫领域腐败提供了一条便捷的信息搜集渠道。

斩断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不仅要靠声势浩大、雷霆万钧的各类专项行动，更需要着眼长久，形成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制度化体系。

在中央纪委的统一部署下，各级党委、纪委因地制宜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不断畅通监督渠道，整合纪检工作力量，发现问题和线索。

2014年以来，贵州省纪委全面整合县级纪工委监察分局和乡、镇、街道纪委力量，以乡、镇、街道为单元设立1489个民生监督组，加强对民生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执纪，主动发现问题、查处案件。截至今年3月，全省民生监督组从专项监察中发现问题39051个，占总问题总数的54.25%。

——不断提高信息透明度，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扶贫资金发放、扶贫政策落实的透明度，让百姓更好地监督和了解。

7月，随着《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施行，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制度武器。

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将严格执行问责条例，不断强化责任追究，通过严肃问责，推动各级党委、纪委特别是县委、县纪委切实承担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党组织落实监管职责。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山西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明确时间表

(上接第1版)同时，实行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对连续两年未发生拖欠工资的企业减半缴存，对连续3年未发生拖欠工资的企业免予缴存。今后，山西省还将探索建立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引入第三方担保方式等，逐步替代工资保证金。

对经营异常企业将实施重点监控。《意见》指出，该省将实行基层预警监控机制。各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日常管理与服务，根据工商、税务、水电供应等单位反映的企业经营状况指标变化情况，将经营异常的企业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发现存在不能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隐患的，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督促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并向上一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报告情况。

违法失信企业将被多部门联合限制。根据省政府部署，该省各地将进一步健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应急预案，完善政府应急周转金制度等。对欠薪逃匿或欠薪群体性案件，按规定启动应急预案，实行政府负责人挂牌督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案件，将动用工资保证金、应急周转金或通过其他渠道筹措的资金予以解决，并依法追偿。

同时，该省将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理和失信惩戒机制。将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相关信用系统互联互通。人社部门将制定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评价办法，定期归集有关部门处理的拖欠工资案件信息，将劳动用工、工资支付情况纳入有关部门诚信信息管理平台或政府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重大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并由有关部门记入诚信记录，按职责依法依规予以限制。